

巩义党史资料

(第十五辑)

· 内部资料 ·

· 注意保存 ·

回忆巩县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忆巩县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张铁弓同志回忆

1955——1957年巩县的审查干部工作

巩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共巩义市委党史征编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六月

目 录

文件转载

- 中共巩义市委《关于调整中共巩义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编纂委员会的通知》…………… (1)

回 忆 录

- 回忆巩县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王祥兆 (2)
忆巩县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孟昭英 (5)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在巩县工作时的情况回顾……………张铁弓 (8)

专 题

- 1955—1957年巩县的审查干部工作
……………中共巩义市委组织部 赵晓明 (18)

巩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巩义市农牧局 赵十一 (24)

资料选登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地方武装游击战

——记白云山反扫荡战斗

.....西村乡党史征编组 (37)

日寇飞机袭巩暴行记.....刘庆昭 (39)

人 物

皮定钧简历..... (41)

徐子荣简历..... (41)

论 文

延安精神与新时代

——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周秀凡 (42)

工作研究

编写基层党史 服务四化建设

——在河南省党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胡兴业 (44)

党史宣教

做抵制“和平演变”的坚强战士

.....吕丰亭 (50)

写党史做奉献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记巩义市几位已故党史工作者

.....白继周整理 (52)

光荣榜..... (58)

简 讯..... (60)

中国共产党巩义市委员会文件

巩文〔1992〕6号



关于调整中共巩义市委 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市直各单位党委（党组）：

根据市直机关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经市委常委研究，对中共巩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人员组成如下：

主 任：王海泉

副主任：王新义 赵武安 王恒修

委 员：胡兴业 李小合 马心远 姚本立

贾占标 谢同才 刘定坤

中国共产党巩义市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

回忆巩县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王 祥 兆

1948年4月7日，巩县全境获得解放，28万人民重见天日。县委书记吕英、县长徐宝森相继到职，组建县委、县政府，建立民主政权。6月份，吕英、苑春芳、徐宝森、王克天、沈振林等组织起县委领导班子。依据巩县的特点，开始就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即立杆见影，抓出了成绩。4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令人感叹不已。

我印象最深的是，县委领导班子在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还未开始，敌我力量悬殊，支前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从巩县实际出发，注重抓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较为明确的。首先抓回郭镇烟厂和琉璃庙沟、上庄、山川、大峪沟等煤矿恢复生产，商业的恢复与税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仅对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建国后完成各项艰巨任务，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恢复回郭镇烟厂生产

1948年7月中旬，因事去徐宝森的住地蔡庄冯家沟，见到了刚刚到职的工商科长白光，我们彼此自我介绍后，就坐下来听这位曾担任过巩县地下党组织委员、对巩县敌我情况了如指掌的县长谈巩县的情况：巩县工业有基础，商业较活跃，教育发达，知识分子多。因此我们必须作好这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恢复回郭镇烟厂的生产。

当时，回郭镇烟厂远近闻名。过黄河前我们南下干部在温县看到大街小巷卖的全是回郭镇烟厂出的、48根一合的纸烟。以后到洛阳、登封，市场上卖的也都是回郭镇的大包烟。我被分到巩县工作，到了回郭镇，我数了数全镇的烟厂有48家，我曾想过每包烟48根，是否是48家的含义？可见回郭镇烟厂很多，而且行销各地。所以，这位第一任县长上任不久就首先注意恢复回郭镇烟厂生产，并调白光任工商科长，重点抓这项工作。

吕英、苑春芳（苑任县委副书记）、徐宝森为恢复全县工业生产，还建立了县、区工会组织，督促区委、区政府做好劳资双方的工作，解决恢复生产中的具体困难。为解决回郭镇烟厂资金不足，吕英让我将他南下时随身携带的70块银元，送交镇联社负责人胡林旺。当时县工会主席郭海松、回郭镇工会主席张守训等工会干部全力以赴，发动工人群众，讲清政策，解除劳资顾虑，恢复烟厂生产。烟厂生产的恢复，带动了各行各业，关门的商店开张了，停课的学校又开学了，人心安定，群情振奋，给支援前线作好了人力物力的准备。

二、召开全县各界名流代表会

1948年8月8日，为了动员全县人民，完成繁重的支援前线任务，县委决定在芝田镇（当时县政府所在地）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到会300多人，其中有：教育界各中小学校长及部分教师；煤矿经理、工厂厂长；工商业者及有名望的开明士绅；烈军属代表及县、区党政主要干部等。大会由苑春芳主持，吕英作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有关政策的重要报告。徐宝森作了新区政策、恢复工农业生产、完成各项任务的动员报告。苑春芳作了总结。会议开的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时间虽然过了四十年，至今给人仍留有深刻的印象。如今大家回忆起那次会议时都说：“那时共产党说的话，铮铮有声，掉地下砸个坑。”的确是这样。这次会议给巩县以后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解放前，巩县教育发达，全县有芝田县立中学，新心、遗爱两所完中，回郭镇职业中学，县立师范、崇仁等6所中学。还有北山口、北瑶湾、石窟寺、黑石关、回郭镇、益家窝等23所小学。不仅学校多，教职员素质好，教学质量也是著名的。芝田各界代表会后，以恢复后的学校师生为骨干，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对动员全县人民完成支援前线、剿匪反霸、民主改革等各项任务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县领导班子，在当时十分繁重的支援解放战争的情况下，仍然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与当时巩县历史条件不无关系。历史上巩县人物荟萃，诗人、学者、实业家、革命者、留学生等代代皆有，特别在近代，革命志士更多。在刚刚解放的土地上，在人民尚有种种顾虑的时候，而且开辟工作又相当繁重，极需要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作感动“上帝”的桥梁，做革命烈火的种子，在巩县大地上起到作用。县领导在教师、大中专学校毕（肄）业生中，选拔了60多名男女知识青年，把他们派到剿匪反霸等中心工作第一线去，让他们锻炼，让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最后的斗争。这批知识分子干部，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又将他们充实到县、区、乡领导班中去，成为巩县干部的一支骨干力量。我记得这些人有：

白延忠、刘贵一、牛先宾、任知时、王志明、焦庭才、刘莲芳、孟宪琴、刘惠明、刘德锡、刘元善、吴福荣、刘绪袍、康淑贞、张巧阁、赵巧玲、于兆瑞、景超群、刘绪轩、白延安、曹俊彤、孟宪雍、崔雪楼、张之初、刘淑静、孟昭英、杨瑞笃、孙良仲、孙良英、范秋琴、马学贤、孟宪芬、曹定、张业明、刘公举、刘公佑、康钦惠、张采云、王淑芳、任竹贞、曲宏济、滑风雨、焦新源、张遇春、周青木、张维诚、尚文传、李振兴、张玉昆、李秋芬、牛月桃、焦如广、焦汝赢、刘元勋、于太衡、刘春光、刘金生、吴海禄、薄芝岩、薄芝正、刘培文、刘惠英、张培贞。

县委也很关心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烈军属子女中选拔培养干部，这些人就成了巩县解放初期干部队伍骨干，在工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恢复煤矿生产

巩县地下煤的储量很可观，是洛阳、郑州、西安等地民用煤主要生产基地，解放前各矿的采掘提升虽很原始，但产量和销路都很好。为了尽快恢复琉璃庙沟、上庄、小关、大峪沟四大煤矿生产，县委及时建立县和各矿的工会并配备干部，发动工人恢复生产。资方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顾虑重重。为了支援前线和城市工业生产及民用，煤矿恢复生产有积极意义，县委、县政府及时召开资方经理座谈会，书记苑春芳反复向他们讲明政策，还多次接待来访的资方代表，向他们作工作，让他们解除顾虑。随着形势发展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四大煤矿陆续恢复了生产。大量的煤炭外运，支援了经济建设。

五、恢复商业和税收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和土地条件限制，巩县做生意的人很多。县领导班子一开始就很重视抓恢复商业这项工作。苑春芳非常注意教育干部，划清地主与工商业者的界限，要发展工商业，支援他们搞好商业活动。但对其违法行为，决不姑息。在干部的艰苦工作下，商业逐渐繁荣起来，税收也一天天增多，它成了豫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徐宝森讲：当时陈、谢大军九纵的给养，主要靠巩县工商业税收筹款。当时全省数万干部的吃穿用，巩县工商业者交的税是重要来源。近几年，巩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年产值达十数亿元，在全省名列前茅。当然应当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正确贯彻的结果。但解放初期，巩县各级干部深入细致地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以往的基础，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发达。



忆巩县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

孟 昭 英

背 景

巩县和全国一样，1953年对粮食实行了统一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实行这一政策是有它的背景与基础的。首先，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在经济上分到胜利果实，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到1952年，巩县的农业生产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部分农民手中有了一定的余粮。其二，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一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并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增多，粮食销量也将大大增加，单靠粮食征购远远不能满足商品粮的需要。其三，经过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虽然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但对民族资产阶级仍执行保护政策，允许他们合法经营。当时的粮食市场仍是自由市场，社会上相当数量的粮食控制在粮商手里，他们中间的不法分子，对粮食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特别是巩县（当然不只是巩县）在1953年春季，小麦正在拔节孕穗，突于4月12日黎明前普降严霜，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晚霜冻害，已拔节孕穗的小麦倒伏枯死，全县有64个乡受灾，以回郭镇、芝田、鲁庄、涉村等区、乡最为严重。全县受灾面积达50万亩，占总面积的31%。面对灾情，人心惶惶，不法粮商大肆活动，一方面向农民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甚至买青（苗）预购（粮），一方面哄抬粮价，牟取暴利。在这种形势下，有余粮的农民看涨借售，缺粮的农民倾囊抢购，国家粮食部门销粮猛增，最多全县每集销粮达41万斤，较灾前增加30%。为了稳定市场，平抑粮价，保证灾民口粮供应，县委、县政府一方面打击不法粮商，一方面从东北调进玉米等粮食2723万斤，抛售市场，同时对严重缺粮户发放借粮40万斤，这才使紧张的粮食局面缓和下来。综观上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国家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运 动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的供应问题，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粮价，保证城乡人民基本口粮需要，巩固工农联盟，加速实现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政务院于

1953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粮食统购统销运动。

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传统的粮食市场的自由买卖状况，改变旧的习惯势力，必须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进行巨大的、艰苦的政治思想教育，统购统销一开始，就是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为了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统一全党思想，巩县于1953年11月13日至24日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613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以整风的精神进行的，并宣布了极其严格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保证中央粮食政策的贯彻实施，自家有余粮的必须带头卖给国家，会议期间任何人不得向外（包括家属）透漏消息，不准抢购粮食，否则共产党员要开除党籍，国家干部要开除公职。在党代会结束前的11月21日，才向全县宣布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并宣布冻结粮食市场，

会议一结束，县委立即组成了工作组，到七里铺搞试点，我当时任县委秘书，主持县委办公室工作，也参加了试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依然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对余粮户逐户摸底排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然后工作组和乡村干部，分头深入到余粮户，和他们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他们卖余粮。开始有的农民顾虑重重，怕露富，把粮食东躲西藏，给工作员吃的饭也是糠菜窝窝。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同时还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发动余粮户的亲戚、朋友、对劲人去个别做工作，说服教育，余粮户的思想逐步被打通了，他们高高兴兴卖了余粮。送余粮那天，卖粮户整队出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好不热闹。带头卖余粮的和卖余粮多的除披红戴花外，工作组和乡村干部还给他们拉马铤，使他们感到无上光荣。这次全村共卖余粮7万多斤（具体记不清了）。从七里铺试点看，运动是健康的、成功的，为全县开展运动摸索了经验，闯出了路子。

为了加强对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领导，县委于1953年12月16日，决定成立粮食工作委员会，县委副书记孙天佑（主持县委工作）为主任，县长杨福祥为副主任，13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孙万选为办公室主任。各区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我县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于1953年12月10日全面展开，全县组织了282名干部（内有县委8人，区委和相当区委的98人），深入农村领导运动，到1954年2月初，共50天时间，全县运动基本结束，共统购粮食750.8万斤，占任务860万斤的87.3%。

继1953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后，1954年至1956年3年间，每年夏秋两季的统购统销，全县干部基本上都是全力以赴的，真可谓“全党搞粮食”了。在这几年之后，粮食统购统销才逐步形成制度化、习惯化了的正常工作。时至今日，距统购统销运动已30多年了，三十年来，之所以能保证城乡人民的口粮供应，保持粮价基本稳定，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以大规模的开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问 题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统购统销运动也是这样，主要问题是，当时巩县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从巩县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单纯强调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而不顾实际可能，统购过了头，购了不少“透底粮”，造成统购后又大量返销的被动局面。例如，1953年巩县粮食总产量为13890万斤（市斤，下同），全年统购（包括征购）粮食为1563万斤，统销为5129万斤；1954年粮食总产量增长到16220万斤，比上年增产2330万斤，而统购量也达到2930万斤，比上年增购1370万斤，统销为5210万斤，这就是说，1954年全县增产的粮食，60%被征购去了，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每人平均留口粮的情况是：1953年为349斤，1954年为350斤，1955年为358斤，当时农民就有“够不够三百六”之说，实际上每天平均还不到一斤原粮，而细粮留的比例更少，只按7、8、9三个月留细粮，一般每人平均留麦子90—120斤，因此一到冬春天，农民吃白面就很少了。大牲畜留饲料的情况是：骡马每头全年留550斤，驴300斤，牛80—120斤。况且上述数字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纸上的数字，有的还有“水分”，二是区、乡、村、户之间有很大的不平衡性。由于人的口粮和大牲畜饲料不足，特别是出现大量的“透底户”，在统购后不得不又大量返销，往返运输，劳民伤财，农民意见很大；有的地方大牲畜体质下降，瘦弱不堪，当时群众形容牲口是：“三快”，即脊梁骨比刀子快，尾巴骨比锥子快，走路比蚂蚁快。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大牲畜的瘦弱情况。另外，由于不能实事求是，助长了干部的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的作风，1953年至1956年的4年中，因粮食问题而自杀的农民，大约有×××至×××人之多。

由于我在1954年9月至1956年12月，先后任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部长、县委委员、常委，主管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在农村跑的时间较多，对实际情况了解的亦较具体，对存在的上述问题，我有一定的看法，并积极向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反映，但均未被采纳。在1956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县委召开粮食工作紧急会议之前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我曾公开提出：（大意）统购应实事求是，决不再购“透底粮”，上级分配的任务和实际情况发生矛盾时，应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向上级反映减少任务，统购时坚持实事求是，统购后除了天灾人祸造成的缺粮户和人多地少等必须统销的外，一般不再返销。否则，每年大购大销，不仅劳民伤财，也势必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偿失，对农业生产不能采取“杀鸡取蛋”的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这些意见不可能被县委常委所接受，因此，在这次常委会议上，我还以共产党员的权利正式声明保留了意见（有常委会记录）。此外，在1956年冬召开的全县农业合作化干部大会上我作了总结报告，在讲到当前存在的问题时曾说过：“我县在反右倾的大旗下面，孕育着左倾的萌芽”等（发有讲话稿）。我的上述看法和意见，虽然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对的，但在当时却是不能容忍的。我以后的不幸和厄运，我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在巩县工作时的情况回顾

张铁弓

我是1950年10月，从郑州地委到巩县城关区（亦称五区）工作的。当时，因原区委书记兼区小队政委刘景周调地委工作。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苑春芳给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李福祥打电话说：城关区是个比较复杂的大区，请求地委给派个区委书记去。李福祥接到电话后，便与当时的地委秘书长王廉清商量，王即推荐我去，于是福祥就对我说：“铁弓，你还年青，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需要到下边锻炼锻炼（当时我25岁，在地委任机要秘书）。”因为我对福祥和廉清都很信任，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下去试试。所以，我就按地委组织部的决定，把工作交待给我爱人武双林，带了个简单行李到巩县去了。

到巩县那天，天阴得很重，还飘着几片雪花。一下火车，我就边问边走到县委报到。因为我在地委做机要工作时，县里还没有机要室，县委书记和县长回地委开会时都要找我看《电讯》等机要文件，我对苑春芳也熟悉。于是苑春芳一见我，并看见下雪，就幽默地说：“铁弓，你可真是雪中送炭来了。”随即请县委组织部长孙天佑和县委秘书张存尧，给我谈了谈城关区的干部情况与当时的中心工作，就叫县委组织部干事李绍孔送我到城关区去了。

一到城关区，首先见到的是区委副书记朱茂发。他是山东人，讲的一口山东方言，带着一支很好的二八盒子枪，不时向院里的树木瞄准，是一位忠诚老实、又很热情的好同志。茂发随即叫来当时的区长申砚田和其他区委同志。砚田是山西人，讲的一口晋东南土语，腼腆得象一个大姑娘。他们几位同我谈了一个下午、又半晚上，谈得很好很具体。虽然朱、申二位都比我大了几岁，但因为我是刚来的，大家分外照顾。从此，我就和朱茂发像兄弟俩一样，住到一个石头砌的大窑洞里工作了。

第二天，茂发和砚田又带着我步行到站街周围转了一圈，边看地势，边介绍情况。走到站街集上时，砚田指着南瑶湾沟口的笔架山对我说：“你看，那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家，我们和杜甫成邻居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话虽如此，由于巩县这个地方丘陵起伏，地形复杂，火车站是坐西北向东南，县委机关是坐西向东，区委机关又是坐南向北，一下火车我就转了向，一直转不过来。加之正值冬季，草木凋零，比起熟悉的地委大院很不习惯，不免有点陌生的感觉。但是，既然来了，就下定决心，在县委的领导和

同志们的帮助下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弥补我南下以来一直只做机关工作的缺陷。

我在城关区工作时，因农村工作受季节支配，大体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冬天的两个来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1）解决土改遗留问题，看有没有漏网地、富，有没有伤害中农的情况，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2）组织群众在公路两侧炸敌人遗留下来的炮楼，到孙家湾打石头，石河道砸石子，在各村烧砖瓦，搞运输等工副业生产。因为我初到下边，所以把面上工作交由茂发和砚田主持，我集中力量跟着一个地理熟悉的、名叫韩喜根的通讯员走乡串村熟悉情况。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仓西、老城、集沟、新沟、大黄冶、小黄冶、海上桥、黑龙潭、大峪沟、玉皇庙、岳寨、柏圪塔、杨里、柏茂、巴阎、南瑶湾、北水、金源英、洛沙、双滩仁、杨泉、官柏荣、胡坡、鲁村、站街等27个乡镇和岳岭、驻驾河、三义沟等部分自然村。每到一乡，先到支部书记（当时因党没有公开，支部书记都以农会主席的面目出现）家吃顿饭或者住一夜，广泛交谈，了解情况，下余时间住到其他贫下中农家里，有时和群众谈谈，有时开座谈会，有时由支部书记领着到各个自然村转转，看看各乡的地势、方位和土地，指指哪一家是贫下中农，哪一家是地主、富农。其实，那时候的地主、富农很好识别，凡是地主、富农，一见干部就低下头站到路边去了。经一两天之后，再跟着那个背鸟枪、骑车子的通讯员另换一乡。这两个月，虽说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确也了解了一些情况，认识了许多人，无形之中感到心里有事了，嘴里有话了，说话办事心中有数了，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勇气。同时，也感到城关区的群众很好、很热情。城关区的群众，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确是非常爱国的，党指向哪里，人民群众就干到哪里，一呼百应，毫不含糊，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很坚决。加之，城关区的方言很中听，如“汉子”、“媳妇（音囚）子”（妻子）、“抓”呀、“中”呀，既粗犷，又朴实。再如早饭不叫早饭，叫“饭时饭”；晚饭不叫晚饭，叫“喝汤”；包饺子不擀片用手拍，死了人不叫死了，叫“不在啦”，还有所谓的“小大衣、黄白菜、铁木欵、炒凉粉等四大矛盾”。说来上口，跌地有声，不几天就和城关区的人们熟悉了。

第二阶段，是1951年的春夏两季。我凭着“两个月深入了解的本钱”，开始“发号施令”、主持工作了。当时的区委书记兼区小队政委，人物不大，但说话也是算数的。比如划成分，大家定不了的，区委书记说句话就算铁板钉钉了。现在看来，在解决遗留问题的那个时期，搞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后来复查时就有点失之过严。

在这年的春夏之交，城关区扩过一次抗美援朝的兵。当时，明说扩军是要到朝鲜去和美帝国主义打仗的，这对解放不久的城关区群众来说，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这时，茂发和砚田已经调走，区领导班子就留下第一副区长牛先宾、副区长刘德厚、区委组织委员王全成、宣传委员胡桂轩和我了。再下边的主要骨干是武装部长孙良杰、妇联主任崔雪楼（后来都参加了区委）、农会主任宁法旺、治安员刘占元、民政助理阎洪刚、文教助理先是刘惠捷，后是王玉湘、财粮助理赵同灿、文书张宝来，共约30余人。当时，县委给城关区内定的扩军任务是120人，但由于我是初来乍到，城关区的兵源又不充足，所以县委宣布时宣布了160人。这对当时城关区的同志来说，确实压力不小。为此，县委书记苑春芳、县长曹干军在向各区做动员时说了许多开心鼓劲的大笑话，并指

定我在各区的报名大会上首先发言，代表城关区向各区（镇）提出挑战。在那次发言时，由于我们区的同志认真地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办法，我又较好地集中了大家的智慧，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响亮提出保证完成200人。这一下把巩县各区（镇）的同志轰动了，人人争先恐后，自报的数目都比县里分配的任务多。

县里的会议结束了，我们的大话也说出去了，怎么办呢？同志们都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回到区上，夜以继日的“连轴转”了。在讨论中，突出研究了加强宣传，动员群众，干部带头，党员带头，表扬先进，层层保护等措施。在巴阎乡召开了27个乡（镇），1000多人参加的扩军干部大会。说是干部大会，其实把许多有兵源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请来了。会议的前两天，统一学习省编印的抗美援朝宣传提纲，“扩军”二字只字不提。我在宣读提纲时两处念到“把美帝国主义象赶鸭子一样赶到鸭绿江南边去”，引起到会同志的轰堂大笑。这时，牛先宾跑到我的身边耳语说：“咱们这里不兴说‘鸭子’那是骂人的话”，这时我才明白犯戒了，于是把本子交给先宾念，先宾念的绘声绘色，效果很好。

在组织大家讨论宣传提纲时，我们区上的同志十分注意到会同志的思想动态，积极发现报名参军的线索与可能性，掌握了一些情况，但究竟如何，尚无十分把握。

在宣布扩军那天，我们为了保密起见，把千余人的大会拉到巴阎乡岭上的野地里开，除我们动员之外，还请始终坐镇这次会议的县委书记苑春芳给大家讲了话，讲得很好，很生动，很有说服力。但是散会后，在回村的路上，千余人都低下头来想问题，很少有人说话，只有几个区、乡干部心中有数，不时说些鼓舞情绪的话。

宣布扩军的这天晚上，很少有人喝汤（吃晚饭），都自动组织起来，以乡为单位开始讨论了。这时，区委把全区划成老城、海上桥、胡坡、七里铺等4个小区，由区委同志带队，把区里和县里来的40多位同志分到各个小区，分片包干，保证完成任务。

这一夜，到会同志几乎未睡，一个一个地讨论兵源情况，研究动员办法，和谁能开了谁的锁等具体措施，以及如何发挥干部和党、团员的带头作用等问题。正在人困马乏，提不起劲来的时候，忽然胡坡乡党支部书记胡三成自告奋勇，送子参军。这一下可把这个会议开活了。我们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加表扬，号召到会的干部都向胡三成学习。在胡三成的带动下，有的村干部表示回去和家人商量，有的提出实在不行就自己去，情绪活跃起来。这时，杨里乡党支部书记张家不慌不忙地说，他已动员好到会女青年张满送郎（未婚夫）上前线，这一下可把大家乐坏了。于是乎，半夜一点多钟，把马灯吊在院里，召开大会，表扬胡三成送子参军与张满送郎上前线的光荣事迹，并请胡三成和张满在会上发言。这时，我们为了让大家看清胡三成和张满的英雄形象，把马灯举在张满的面前，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猛击一拳说：“人家是没过门的姑娘。”这时我才发现快三点钟了，苑春芳还在我们的会上。原来，春芳听到胡三成送子参军的消息和一部分乡、村干部准备回去和家人商量的消息后，就感到是个很好的苗头，于是带着他的警卫员李天保走近路（一里多路）赶回县委，把办公室的同志从梦中叫起来说：“下边打大仗，你们睡大觉，能睡着吗？”当时叫县委办公室的同志用电话把胡三成送子参军的消息通报全县。等他安置好回到会上，又遇上张满送郎上前线的大好消息，于是又

叫他的警卫员赶快回去，叫办公室再向全县通报一次。苑春芳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坐镇城关，指导全县的。

会议以后，我们把区委及各个小区的同志集中起来，研究如何运用大好形势，迅速扩大战果的事。胡桂轩提出：还研究什么，事情已经公开了，还不赶快拿着胡三成和张满这两块金牌回去做工作，三天之后把兵送来就行了。这时同志们心急如焚，都同意赶快散会，赶快回去做工作。于是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大会，既未总结，又未宣布散会就不宣而散，星夜赶回去了。各乡的同志回去后，一进村就边宣传、边动员、边报名，一锅煮了。煮的结果，3天之后，东西泗河两边的各乡大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唯独山上的杨泉、褚岭、宫殿等乡遇到困难。村看村，户看户，人看人，谁都不愿报名，把我们派到褚岭去的谷长治和禹淑兰气得回到区上抱头大哭。这时，我带着谷、禹二位和一个通讯员连夜赶到褚岭，就在打麦场上办公，只听村干部说：“没办法，我们都去好了。”问及详细情况，都说本村有个老头，听说扩军，就在村上串连：“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并煽动群众咬干部。问及这个老头，村干部又说：“他家有3个儿子，两个够参军条件，就因为他家富，不缺吃穿，谁也不去。”我听到这个“富”字后，脑子里即闪现出阶级斗争的观念，放下参军不说，先问：“他家怎么个富法？”这时，人们有点气了，有的说：“他家雇过长工”，有的说：“他家有剥削”，还是一位20来岁姓谢的妇女干部起来说：“他家在解放前，经常雇一个长工，有时雇两个，解放后一个不雇了，但夏收夏种雇的短工加到一块，比两个长工还多。”我又问大家：“对不对？”大家异口同声说：“一点不错。不但有剥削，他还操纵我们这个村子哩，村干部说了不算，都得听他的。”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我便脱口而说：“这是个漏网富农，并有破坏活动，派人把他捆起来。”捆来后，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七言八语斗了一顿，然后路经杨泉、宫殿等村送到区上去了。

把此人送走后，打麦场的旁边过来一个穿得不甚整齐的青年问我：“政委，咱们什么时候走？我妈早就把鞋子给我做好了……”这时，我顾不上他还说了些什么，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同志，咱们下午就走。”这时，在打麦场上的数十个人，不约而同地一次又一次地热烈鼓掌，那发自肺腑的掌声很响很响。在这位青年的带动下，村干部又做了些动员工作，当天下午，就有4个青年报名参军，超额1个完成了扩军任务。在褚岭村的推动下，山上的几个村子也很快完成了扩军任务。全区超额80人完成了县里分配给我们的任务。

在向县里交兵的那天，各村的干部可精神了，一大早就领着自己的新兵，佩着碗口大的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区上了。全区集齐后，我们区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带着全区的200名新兵，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到县里报到。一到县政府的大礼堂门前，就遇上迎来的苑春芳和曹干军，他俩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铁弓同志，你们辛苦了，给全县带了一个好头，我们感谢你们。”我说：“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全靠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好。”

兵是交了，但在交兵的当天下午，我到理发店理发时，理发师问我：“你的头发是什么时候掉的？”我用手一摸，方知头的右侧掉了指头肚大那么两片，我说：“我也不

知道。”后来理发师告诉我：“今后要三天五天经常刮刮，刮了以后用鲜姜擦擦，也许还能长起来。”不到半年，整个头发都掉光了，开始我戴上帽子，后来一出汗就把帽子沾住了，就干脆不戴。到当年的春节又去理发时，基本上长全了。所以在巩县工作过的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见我便问：“你的头发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回想起来，在过去40多年的漫长工作中，再没有那次扩军费劲了。

城关区扩军的胜利，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要不是全区的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要不是胡三成、张满和褚岭那位青年带了头，我就是再掉一次头发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一年的夏天，我们还完成了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这就是第二次镇反。

五、六月份的一天，县委忽然打电话叫我一个人去。等我去时，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全县各区（镇）的区委书记们都坐好了。苑春芳开始说：“今天请大家来，有一个艰巨而又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关系到我们的政权能否巩固，能否在这个地方站住脚的大问题。现在请郝局长给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你们先把任务带回去，再和乡里的同志研究怎么完成。”说罢，县公安局长郝占兴说：“上边统一布置，某日某夜的12时，把全县的镇反对象统统抓来，一网打尽。我们掌握的线索交给你们，你们回去再根据“民愤很大，不镇压不能平民愤”的原则，把应该抓的人统统抓来，并要绝对保密，谁走漏风声谁负责。”说罢，县长曹干军又说了几句。不到一小时，这个会议就结束了。

回到区上后，我们又召集区上在家的几位负责同志和少数骨干研究了一下，连夜发出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召集各乡支部书记、民兵队长开会，传达县委指示，提出区里的意见，叫大家分别讨论报名单。这时，各乡来的同志各自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耳语去了。有的独立思考，有的稍微征求了一下邻村的意见。不一会就一乡一乡分头向区委报名单，汇报完一乡走一乡，不多时就急急忙忙、默默地都走了。

第二天的下午5点多钟，我们叫了区上的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志，腾出一孔大窑洞，并告诉这几位同志：“你们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好好看住这个窑洞，只许有人进，不许有人出，若跑了一个，你们负责。”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区委的同志和区武装部长、区治安员，枪上膛、刀出鞘，坐在区委会的院子里，等收镇反对象了。刚过12点，南瑶湾等邻近各乡就送来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带队，每有1个对象，就有两三人押送，不到下两点，27个乡（镇）的人就都送齐了，按头天报的名单一个不少，全部抓起来了，总共是70多个人。

把镇反对象关好后，各乡的干部和押送的民兵自动聚到区委会的大窑洞里，床上地下坐得满满的。乡里来的几位支部书记对我说：“政委呀，自打区上回去以后，我就没有吃一口饭，眨一下眼，生怕那家伙跑了，天一黑我就把他们叫到乡里开会，一到12点捆上就走。”并指着周围的民兵说：“要不是大家帮忙，怎能搞得这么快呢？”由于当时的许多支部书记，象胡坡的胡三成、七里铺的曹海法、柏茂的张金聚、柏圪当的王喜，杨里的张家、仓西的李鉴玉等，都比我们区委同志的年纪大，听了他们的诉说，我们区委的同志很受感动，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安慰大家，感谢大家，鼓励大家为革命

立了大功。这天晚上，区政府破例招待，凡从乡里来的同志，都到区上免费吃饭，在砸炮楼的钢筋款里开支。吃过饭后天已麻麻亮了，我们把大家送得很远很远，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三天的一早，我们到县委去汇报抓捕情况，县委很满意，并在当天的天黑之后，公安局来了10多支枪，我们又派了10多个人，把70多人押到县监狱去了。后来听说，少数当即镇压，多数关了起来，个别的经过教育，悔改很好，揭发有功，征求乡里意见，取保释放，回村里监督劳动。

这次镇反，时间虽短，但由于始终坚持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依靠党的办法，工作做得比较好。对打击敌人，支持群众，稳定形势，发展工作，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一年的夏天，我们还干了一件组织千军万马到石河道砸石子的工作。当时，郑州修建飞机场和三六三电厂，石子用得很急，我们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一位副区长带队，组织了1000多人到石河道撑起帐篷，昼夜不停地为国家建设砸石子。做具体工作的好像是巴阎乡的冉舜，冉在分工、收方、发运、分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那时候，组织起来的人，有男有女，还有少数儿童，但白天黑夜秩序井然，没有出过一点问题。同时，因为劳动力强弱不同，分配也不好掌握，但群众从未有争争吵吵、讨价还价的现象，国家给多少就要多少。南瑶湾的李妮是个男性中年农民，在石河道砸石子时干得很好，在发工资时，只因名单上同时出现了两个李妮，发钱的人误认为是重名，把男李妮的名字划掉，只给女李妮发了工资。男李妮知道后笑了笑说：“没有事，谁叫咱叫那女人名字呢！”后来区上发现后，专门叫冉舜带上款，赔情道歉，送工资到家。李妮见到冉舜后说：“共产党真好，要是从前，谁还给谁送哩！给国家干点活算什么，人家当兵的谁给发工资了？”那时候的人，觉悟很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很好，只要说国家需要，给钱不给钱都行。

第三阶段，是1951年秋冬到1952年春。这几个月，除一位副区长领着几个人坚持生产之外，其余的同志集中力量搞土改复查和复查补课。所谓复查，就是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重新发动群众，查阶级，划成份，对的不动，不对的重来，对地主，政治上坚决打击，经济上彻底清算，坚决消灭不彻底现象。这次复查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是县委把城关区作为土改复查的试点，派团县委书记姜文选、县妇联主任武双林、县监委副书记白保宽、县委宣传部郝群带领各自的若干干部到城关区帮助工作，上列4位同志参加区委为委员。并让米河区的区委书记姬学武、芝田区的区委书记高仪、回郭区的区委书记郝福田带领3个区的200多名区、乡干部到城关区帮助工作。并在介绍信上明白写着姬、高、郝3同志参加城关区委为委员，其他同志在城关区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姬、高、郝3位同志都是很熟悉、很有经验的老同志，但工作起来往往是或举手同意，或提点建议供参考，工作得很谨慎，对城关区帮助很大，给城关区的同志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是这次土改复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二，是省直机关派到巩县参加复查的150多位同志，县委也派到城关区。带队的是